

中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



上海烟厂工人开展抗日罢工斗争

抗日战争极其残酷艰难,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为工会制定了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全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在根据地,工人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到1945年初,全国根据地工会会员已发展到了92万人之众。工人群众不仅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反扫荡战斗,还普遍组织民兵、工人自卫军和工人游击队。工人们一手持锤一手持枪,边生产边战斗,成为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太行山区的黄崖洞兵工厂,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当年生产的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黄崖洞兵工厂的前身是1938年9月由115师和129师的修械所合并而成的总部修配所。当初,只能修理损坏的刀枪,兼造地雷、手榴弹,设备简陋程度还不如“王二麻子”的剪刀铺。1939年7月,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为摆脱

“背着工厂打游击”的局面,迁进黄崖洞,依山创业,建成拥有700名工人、机器设备40部的兵工厂,年产可装备16个团,被朱德、彭德怀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当初筹建黄崖洞兵工厂时,这里都是道路险阻之地,要靠人力肩挑背扛,靠毛驴运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一些大的设备不易搬运,只能拆成数块,一人扛一部分运进去。当时的锅炉就是分成11片,一片一片地搬到黄崖洞,再铆起来重新组装,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黄崖洞兵工厂工人就是靠着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工奇迹。兵工厂的车工甄荣典,从当学徒时候起,一直干车炮弹外圆的工作,别的工人大多因体力扛不住,三两个月就要调换工作;而他一直在水力轮带旁坚守了5年,最终达到了一天480发五〇炮弹外圆的记录。他先后获得“炮弹大王”、晋冀鲁豫边区“新劳动者旗手”等多项光荣称号,并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根据地工会还发动和组织工人创建战时工业,广大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缺乏资金、设备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因

陋就简,因地制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根据地建起了近代工业,生产民用工业和军工产品。各级工会发动工人群众投入大生产活动,号召学习劳动模范赵占魁,积极投入劳动竞赛。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生产出了民生产品,还供应了前方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器。

根据地工业的兴旺发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支援了抗战,还锻炼和培养了大批工业管理人才和优秀工人。工会在根据地不仅发展工会组织,组织工人发展生产,还在提高工人的政治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根据地,结合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民主建政的群众运动,工会普遍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削弱封建势力,减轻雇主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比如选举工人参议员,参加抗日民主政权,执行根据地的劳动政策,适当提高工人工资,组织失业工人举办手工业合作社,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开展娱乐活动。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使根据地的工人群众感受到了一种新气息,体验到了一种新生活,有了奋起向上的积极性,有了抗战取胜的信心。

在国统区、沦陷区,工人阶级积极把自己的力量组织在各种团体中,准备武装起义,一旦时机成熟,就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消灭日本侵略者;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对工人进行训练并提拔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当地工作,准备收复失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普遍开展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侦察敌情、瓦解敌伪军警、保护工厂等斗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牵制了敌人的力量,有效地支援了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任敏)

太行深处有娘亲： 探访抗战英雄团体“太行奶娘”



她们是曾用甘甜乳汁哺育八路军将士后代的一个个鲜活生动感人的农村妇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太行山革命老区传来喜讯:经过百余民间热心人士4年多横跨三省五市十余县的苦苦找寻,已经有上百位“太行奶娘”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她们不顾生死、不畏艰辛,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八路军将士的后代,每个奶娘身后,都有一段感天动地的亲情故事,如今这些真实的故事,已经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为太行山抗战历史增添了宝贵的新篇章。

记者走进太行山深处的左权县七里店村,见到了已93岁高龄的张招弟老人。她的讲述需要小女儿锁先帮助复述,1944年秋天,日本侵略者的炮弹炸死了张招弟的男人,战火年月还使她3个儿女夭折,但她用奶水养育了3个八路军夫妇的后代,第一个养育了3年,第二个哺育了10个月,第三个抚养了整整16年,她给孩子取名“和平”,小“和平”进城后,至今和奶娘亲如一家,每年都要回左权看望奶娘。

最早动意找寻“太行奶娘”的《人民日报》老记者段存章说,他看过罗

瑞卿女儿罗峪田的文章《我的太行山妈妈》,他听过刘伯承儿子多次回左权寻找奶娘的事,他了解太行山老区到处都有八路军后代寻奶娘,太行山奶娘盼奶孩儿流干了眼泪的故事,全国妇联离休干部侯香莲告诉他:“我有两个孩子的奶娘是在太行山的武安、邢台县。”老人临终前对女儿说:“记住!你们是吃太行山小米长大的,不要忘了根。”正是在这种感人事迹的触动下,段存章开始带动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百余位热心人士加入到抢救历史、找寻“太行奶娘”的壮举中。

从抗战开始的1937年起,129师及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党政军机关7万余人驻扎左权,期间成对的革命夫妻先后在这里生育,他们奔波在枪林弹雨中,无奈把孩子都寄养在了老乡家里。圪塔山的奶娘李果兰父母为保护八路军托付给他们的孩子,把母女藏进山洞,俩人被鬼子刺刀刺死;南窑村的奶娘杨玉莲抱着奶孩儿被鬼子追赶,她急中生智把孩子安置在隐蔽处,自己连喊带叫把鬼子引开跳了崖,所幸落在灌木丛中才保住性命。像这样的“太行奶娘”还有许许多多。(欣华)

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价值观、政治立场、学术追求等诸多方面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对立,“知识分子”或许从来都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群体。然而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全面深刻地考验着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在民族危难面前,仅仅沉湎于自己的科学、艺术殿堂,似乎成了“缺乏气节”的表现。

战争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观念。西迁也好,南渡也罢,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所有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行进路线,有踌躇,有困惑,有悲观,也有喜悦。这一个个体的选择,最后竟共同促成了抗战时期知识和思想的迸发,使文化薪火相传,他们的爱国热忱至今都让人为之震撼。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

从浙江杭州出发,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8月12日,一支由浙江大学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终抵贵州遵义和湄潭。

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艰苦辗转的路线。这条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的路线,就是至今仍被浙大人津津乐道的“西迁”之路。

“学习西迁的历史,是我们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学天说。在他看来,只有到过抗日战争中浙大走过的地方,才能亲身体会到他们和那一方水土至今仍存的连结,感受到历史的印痕,体悟到使命和责任。

1937年8月,杭州告急。为了坚持学业,并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分子,竺可桢毅然率领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辛征程。

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员。怀揣科学救国信念的他,几个月前拒绝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的挽留,返回祖国,才刚到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

知识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国家。在谈家桢归国前后,志在报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正陆续回到祖国怀抱。国内高校,也一时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

早年曾留学日本的数学家陈建功,于1929年谢绝了日本的工作,回国加入浙江大学。其好友苏步青,也在1931年接受了他的邀请,从日本回国与其共事。同年,化学家杨石先离开耶鲁大学回南开大学任教。1934年,物理学家王淦昌,也结束了在德国的学习回国,并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

但随着战火燃起,许多院校蒙受损失,被迫停办。为挽救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大学被有计划

地迁往深居腹地的西南、西北。数据显示,当时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迁至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此同时,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等高校,于1937年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山东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山东高校,于1938年迁抵四川。浙江大学则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州,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和永兴继续办学。

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迁徙,行进行异常艰难。据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唐觉回忆,师生途中乘坐的铁皮火车,由于曾遭日军轰炸,夜晚的凉风肆虐而入。“冷得不得了,吃也没的吃,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都硬撑着。”他说。而支撑他们走完迁徙之路的则是“不做亡国奴、与大众共赴国难”的信念。

个人追求让位民族利益

抗战爆发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7年7月10日发表《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号召“全国的同胞们一致起来!为民族的生存而战!”

“中国知识界的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说。这条统一战线,云集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教授、律师、出版家和新闻记者等多个群体。以宣言、电影、歌曲和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抗日救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以提振国人抗击侵略的热情和信心。

从山东赶到武汉的老舍,加入了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总务部主任一职。除了要为文协的各种活动四处筹备经费,老舍的文学创作也在炮火中迅速转变。

抗战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他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工具,一再强调:“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

但随着强寇迫近,家国濒危,全部良知都在命令他放弃一切个人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甚至不惜牺牲艺术品格。“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南下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武汉之后,老舍停止了已经写有10万余字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写作。

“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老舍曾在文章中写道。他不顾得失毁誉,“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结合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

在沦陷区里潜伏

无法苛求每个人都在战争中保持冷静,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可以用研究,用笔墨明示自己的风骨,而还有一部分留守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他们就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危险。

1936年辞去北大教职迁居上海的马叙伦,在上海沦陷后留起胡须,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曾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被他言辞拒绝。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则因拒绝就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长,在1938年4月遭敌伪暗杀。

“如果说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在以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撑着民族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话,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主要为民族战争提供着精神支柱、精神食粮。”杨凤城说。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和灭绝,中国大批珍贵文物和文化典籍遭到肆意掠夺和焚毁,沦陷区还被迫实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胜利后整理编撰的《被

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物,查明有据者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3607074件,另1870箱;又被劫古迹741处。以上估价共值国币(战前币值)9885646元。”

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保护文化便是他们抗争时的主战场和抗战前线。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郑振铎没有离开上海,当他知道日本人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留在沦陷区抢救本民族的文化。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

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怀疑他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郑振铎才告别暨南大学,在《最后一课》中他写道:“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1958年8月,郑振铎在《光明日报》上表露心迹,“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亦文)